

2008年5月 第七卷

M 悦读 K

主编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章培恒先生和《中国文学史新著》

资中筠初识印度

类型文学：下一站的天后？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我

一九四三年傅雷致黄宾虹书

今日三峡

为邓小平做手术

基辛格和天安门风波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7

第七卷 MOOK 悦读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7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MOOK.第七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391-4197-8

I.悦... II.褚... III.书评-选集 IV.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4572号

悦读MOOK(第七卷)

-
-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4197-8
定 价 1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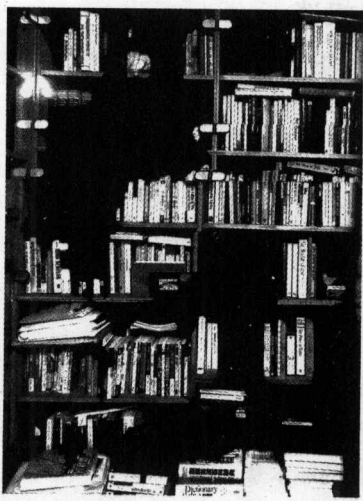
卷首语

着手编选这一卷的稿件时,发现有好几篇是回顾往事的。有对多年工作的回忆、有对童年的眷恋、有对坎坷岁月的陈述……忆旧之作集纳在一起成了这卷《悦读 MOOK》的一个重点。也许这是对当下图书市场中回忆录、口述史类书籍特别受欢迎的一种呼应。

岁月易逝,光阴难驻。人到了一定年龄,总喜欢回忆过去。而年轻的读者则可以通过这类文章,了解老一辈是如何走过来的,熟悉许多已经或正在消逝的风土人情,也可从中得到启迪。

人事有代谢,往事成古今。遗憾的是,现在太多的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历史不甚了了。一位外国学者说过:“国家的命运依赖于该国人民的教育程度。”历史知识的教育,应该是颇为重要的一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拓宽了人们的视野,读者发现某些按既定概念编写的“史书”,距历史的真实颇远,已不能满足求知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提倡过来人写回忆文章,让人们从历史的细节中探求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对历史的一种抢救!

陈寅恪先生曾说:“从历史中求史识,是治史的品格。”写回忆类文章,同样要尊重史实,不能见风使舵,欺世盗名。从已面世的回忆录、口述史一类的作品看,既有优秀的秉笔直书之作,也有鱼龙混杂,借回忆之名隐恶扬善、美化自己的状况。更有甚者,有的还伪造历史,明明当年是造“走资派”反、迫害老干部的急先锋,如今却把自己描写成嘘寒问暖的保护者、关怀者。这样的昧心之作,不仅把水搅混,而且以讹传讹,以虚假当真实,抹杀历史真相,贻害后代。由此想到,媒体和出版单位应该严格把关,对这类作品要从严审读。



M悦读K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目 录

Contents

■ 特稿

- 5 | 章培恒先生和《中国文学史新著》 谈蓓芳
15 | 相关链接 专家学者点评《中国文学史新著》

■ 往事

- 16 |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识印度 资中筠
25 | “照猫画虎”之类 陈四益
28 | 小小忆趣 郭启宏
36 | 非常岁月的生存实录 古 今

■ 清园飞鸿

- 43 | 韦卓民先生致王元化书简

■ 文化现象纵横谈

- 46 | 类型文学：下一站的天后？ 夏 烈

■ 议论风生

- 51 | “强求一致，反伤团结”——从三封信看茅盾 钟桂松
55 | 在孔府买了本有意思的书 伊 人

■ 书里书外

- 61 |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我 朱 正
64 | 谁首先使用“漫画”一词 黄 可
67 | 六十年前的一本禁书 杜 鹄

■ 怀念集

- 70 | 花开正满枝——汪曾祺辞世十周年祭 巫宁坤
72 | 一九四三年傅雷致黄宾虹书 张瑞田
-

■ 《世说》闲批

- 80 | 不求,不与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图
-

■ 悦读一得

- 82 | 读红手记 / 让人着迷的甄士隐 徐缉熙
85 | 三十年后看改革——
 近期改革开放三十年出版物综述 楚 越
87 | 罗素的话还挺管用 吴立昌
-

■ 域外风

- 89 | 在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墓前沉思 蓝英年
100 | 帕斯捷尔纳克“卡”住了 虞非子
108 | 昨日的战争 萧文泉
-

■ 海外书情

- 112 | 地下世界的传奇间谍——为诗歌而生——太空航行的
 浮士德——通向权力之路——无与伦比的永恒之
 城——伊拉克的创建者——过去他们吃什么——牛
 仔英雄

■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120 我国出现新一轮“脑体倒挂”现象——罗马教廷与时俱进 “新七宗罪”出炉——七千五百万人掌管十万亿资本——袁隆平为何没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的经济是再崛起——中国人的饮酒危情——中国自然资源变得更加“饥饿”
- 特别关注
- 124 今日三峡 汪永晨
- 129 相关链接 三峡工程对洞庭湖、鄱阳湖的影响 李虎军 等
- 历史往事
- 131 为邓小平做手术 李炎唐 口述 肖思科 整理
- 138 蒋介石的四份遗嘱 高群服
- 141 《性风俗》事件 程美东
- 图与文
- 145 2008年的第一场雪
- 人物志
- 151 马三立的“右派”帽子 马景雯 张宝明
- 154 周恩来平祖坟 倪方六
- 156 王震访问英国 辛子陵
- 157 池田大作与中国的几位文化人 李庆
- 文物与考古
- 160 “三希”离合 赵耕
- 四面八方
- 169 中国返回式卫星首征太空揭秘 梁东元
- 172 基辛格和天安门风波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
- 175 美国驻华联络处揭秘 杨贤
- 180 高尔基说谎 狄马
- 182 几个被人忽略的问题 [美]约翰·劳埃德 等
- 养生之道
- 186 如何活到一百岁 [英]弗农·科尔曼

章培恒先生和《中国文学史新著》

◎谈蓓芳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年了。盘点这些年出版的书籍,在学术著作方面,人们必然会想到由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章培恒先生为此书殚精竭虑。

现特刊此文,以作介绍——

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于二〇〇七年九月联合出版后,与二位先生以前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出书后的情况相仿,迅即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从某种视角来看,这次的反响更为广大和深刻,因为不但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人数更多、地区更为广泛(包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著名专家),而且还有许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名专家给予了衷心赞扬,尽管钱理群先生同时也坦率地提出了他的某些疑问和不同意见,而上次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公开加以赞誉的仅个别人。毋庸讳言,我国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无论就思维模式或研究方法来说都有很大

的差别,几乎是各有体系,所以,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和前现代文学发展史的著作能同时为这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所关注和肯定,确实意味着它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倾向。也正因此,《悦读MOOK》的编辑嘱我撰文介绍章培恒先生在此书撰述过程中所体现的独特性和作用时,我一口答应了下来。但是我想,这恐怕不能光就章先生主编此书(包括对许多章节的撰写)的具体过程来说明,而必须联系其以前的有关事情来阐述,于是将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一、章培恒先生的学术基础的夯筑;二、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起步;三、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思考;四、《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构思、撰写及其增订本的成书。

一、学术基础的夯筑

一九五二年十月,章培恒先生进入复旦

大学中文系学习,读二年级下。可以说,这也就是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夯筑学术基础的阶段。

在这以前,他已读过两个私立大学。第一个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那时他很想当作家,以为通过新闻工作既可以认识社会,又可以积累写作素材;但读了一年后至《文汇报》去实习,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这一工作,就在同年转入了上海学院中文系。可是他并不满意那里的教学情况,因而经常不去上课,而是自己找书看。这样过了半年,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忽然想改读医科,便向学校申请退学,但没有被批准。转而申请休学半年,获得了同意,就在家认真地温课迎考。不料在那一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前不久,教育部颁布了明确的规定:大学的在学(含休学)学生一律不得参加高考。同时在这年的夏秋间进行了全国性的院系调整,上海学院奉命停办,其中文系并入了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只好赶快去复学,从而成了复旦大学的学生。

那几年正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集中了许多杰出的学者。他在那里虽只读了一年半(根据当时中央政府的规定,1949年、1950年进入大学的学生都是三年毕业),却决定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

在这一年半里,对他影响最深的教授,先是贾植芳先生,后为朱东润先生。

贾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是“胡风派”(后来一度被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作家,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成就卓著的学者。章先生因为曾经想当作家,看过许多新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都很感兴趣,一下子就被贾先生的课吸引住了。贾先生对学生又很热情,许多学生都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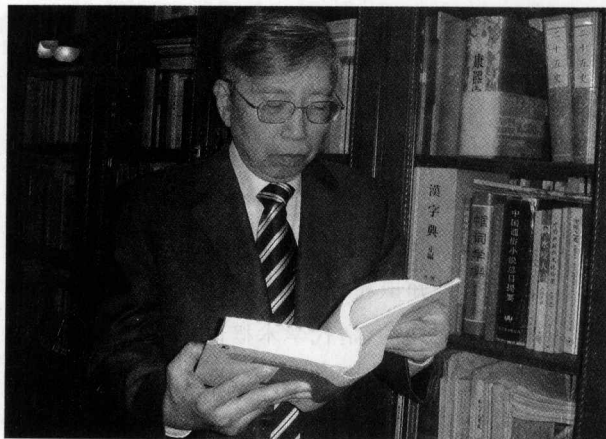
到他家里去聊天,章先生也在其中。在贾先生的熏陶下,章先生懂得了:要研究文学首先必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必须读马、恩原著,不能依据通俗性的小册子;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读现代文学的原作,尤其是鲁迅的小说、杂文,同时在研读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真地分析,结合那个时代的特点和文学发展的趋势,得出自己的结论,千万不能不动脑子,跟着当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著人云亦云。

朱先生是英国留学生,曾在武汉大学教英文,由于该校的文学院院长闻一多请他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他就改而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他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中国出现的第一部从先秦一直叙述到清代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在这之前陈钟凡曾写过一部自先秦至清代的文学批评史,但全书只有七万多字,很难说是有系统的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全部撰成则在朱先生之后),朱先生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指导来研究文学批评史的中国第一位学者(参见朱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卷首章培恒先生撰写的《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探讨方面,他也勇于创新,绝不为人之见所惑。例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把《诗经》中的《国风》作为出于民间的作品成为一种被广泛推崇的新潮,朱先生就公开撰文加以批驳;他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对《离骚》等赋的作者提出新见时,被位高气盛的郭沫若等人扣上可怕的帽子大加斥责,他夷然置之。章先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本来比对现代文学的要差得多,但朱先生一开始就对章先生寻根究底的精神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大为激赏(参见朱先生《朱东润自传》)

368-370页,《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4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在朱先生的鼓动和引导下,章先生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迷恋已经不下于对现代文学的了。不过,真正打动他的,与其说是古代文学研究本身,还不如说是朱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敢于创新、大胆向世俗之见挑战的精神。

朱先生和贾先生的教导,培养了章先生尊重理性、独立思考、重视理论、立足于实证、决不盲从的学术品格。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带来无穷的好处,但也使他较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坎坷。

章先生是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那年他十五岁;建国初期大学里的党员很少,像他那样少年时期就入党的更少,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党委对他也很重视。但由于上述的学术品格,在一九五四年文艺界掀起对“胡风派”最杰出的小说家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时,他认为这种批判是站不住脚的,就撰文为路翎辩护,路翎在自己的反批评文章中还特地提到了这一篇辩护之作;在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对胡风猛烈开火时,章又向《人民日报》投稿,说周扬的批判中存在错误之处。仅仅这两件事就使他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在劫难逃,何况他又与被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的贾植芳先生关系密切,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遭到了市里某机构的隔离审查。幸而当时复旦大学的正、副书记杨西光、王零先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他作了保护,先后担任复旦中文系总支书记的李庆云、蔡传廉先生也对他有所帮助,最后仅被定为“受胡风影响的人”,开除党籍(直到1979年才恢复),调到



章培垣先生

复旦大学图书馆去当职员;而且不到一年就又调回中文系任助教。

经过这场劫难,章先生已经明白研究现代文学容易惹祸,希望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其实他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就已把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研读古代文学作品了。当时的文学教研室主任朱东润先生也赞同他的想法。他本想研究明清文学,因为他对明清的小说、戏曲很感兴趣,朱先生却对他说:“光就明清文学研究明清文学是做不出大成绩的,你还是从先秦、两汉弄起好。教先秦、两汉文学的蒋天枢先生重视打基础,对年轻人很严格,你跟他学要吃一通苦,但对你将来很有好处。”于是他成了蒋天枢教授的助教,同时向蒋天枢学习——根据当时中文系的制度,教授同时是自己的助教的导师。

蒋先生出身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是梁启超、陈寅恪的学生。治学谨严、深入,贯通文史,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对目录、版本、校勘学也深有心得;一生恪守陈寅恪的绝不曲学阿世的传统。他教导章先生说: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打好中国历史和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而且要具备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基本知识,懂得中国古代学

问的若干常识,包括天文历算、历史地理等等。按照这样的要求,蒋先生为章先生制订了前三年的学习规则:第一年读《通鉴》和《说文》段注;第二年校点《史记》,研读《尔雅注疏》;第三年校点《汉书》,研读《尔雅义疏》。在这同时,再系统学习目录、版本、校勘学的知识和尽可能地扩大知识面,阅读诸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唐兰的《中国文字学》、王力的《汉语音韵学》之类的书籍。那三年章先生可真是艰苦备尝,如有一天能睡上五个小时就已心满意足了。虽然后来由于“大跃进”等运动,第三年的学习计划没能完成,但这两年多的学习已使他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后来在考证上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从《大招》的时代背景和写作年代、西汉已有五言诗、传世的李陵诗和书信均非伪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写定于南朝、《玉台新咏》为陈代的宫廷女性——很可能是张丽华——所编,直到《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百回本《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等),在学术界均引起强烈反响。据他自己说,作为论文的根底的怀疑精神源自朱东润先生,考证的功力则源自蒋先生的培养、指导。而且,他在研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细致、周密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他认为也是在蒋先生指导他读书时所要求的谨严的、一丝不苟的作风所培养而成的。

二、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起步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展起来以后,章先生不得不告别了通过系统的学习来夯筑学术基础的生活,并成了复旦中文系从事科研工作的骨干。从一九五〇年代后期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后期,除了“文革”时期的前

四五年外,他的主要任务都是搞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案研究。

其实,就他个人来说,从事古代文学的个案研究是从“大跃进”以前的一九五七年就开始的。蒋先生在年轻时写过一部规模颇大的《全谢山先生年谱》,据说曾受到陈垣先生的重视。章先生为了更好地领会蒋先生当年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也想写一部类似规模的年谱,只是拿不定以谁为谱主好。正在此时,恰好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洪昇的诗集《稗畦集》和《稗畦续集》,那在以前是很难见到的书。所以,章先生就想以此为依据,编写一部《洪昇年谱》。工作进行起来以后,他发现材料越来越多,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自己的进步也越来越大、越快。

不过,这是他个人在进修之余所从事的科研。“大跃进”开展起来之后,系里原先让他在蒋先生指导下系统进修的事就停下来了,从事集体科研项目则成了他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在这些任务中,对他个人的成长最为重要的,是参加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辞海》中国古代文学条目的撰写和修订。

在“文革”以前,章先生有将近两年时间参加《辞海》此项条目的撰写、修订;“文革”开始以后,他虽然进“牛棚”、挨批斗,但从一九七三年起又以“一批二用”(先批判,后使用)的“白专道路”的典型身份参与修订、撰写《辞海》的工作,约经三年。在前后共五六年的时间里,他由此阅读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千数百种(包括诗文集、词集、小说、戏曲等),细读的和浏览的约各占一半。这为他以后的主编、撰写文学史作了较充分的材料的准备。

参加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

史》的写作始于一九六二年,章先生承担的是明清的小说、戏曲批评和晚清文学批评。在“文革”以前,刘先生只将此书的上册改定并出版。至于章先生承担的部分,因在全书的最末,故除关于金圣叹的一节外,刘先生并未拿去看,一直存放在章先生处。“文革”时经过抄家,稿子全都丢失了。但参加这一工作对章先生却关系重大。他后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学说作为其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实以此事为最早的契机。

明清小说戏曲批评的重镇是李卓吾。因为章先生承担的撰写任务不多,可以从容不迫地工作,加以刘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借了一个大房间作为他们的工作室,借书很方便,于是章先生就把当时能够找到的李卓吾的著作全都借来读了一遍,从中发现了这么两段话: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迹言也。((《焚书》卷一《答邓明府》))

夫唯以迹言为善,则凡非迹言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道古录》卷下))

而且,在李卓吾的其他文章中也常有类似的见解,看来这是他的主导思想。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这可是标准的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而自“五四”以来,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李卓吾都是已有定评的进步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怎么来解决这一矛盾呢?他想到了回避一法:好在他们要写的是文学批评史,不是思想史,这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

不谈。但回避显然不符合章先生的性格。这问题不解决,他心里老是放不下。于是他想到了贾先生以前对他说过的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读马、恩原著的那些话,决心通过读马、恩的书来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他连续读了好多种马、恩的著作,终于从《神圣家族》中发现了这样一大段话:

……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同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则还需要详尽地阐述。我们在这里只引证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著作中的一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段落。

(1)爱尔维修。“人并不邪恶,但却是从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应该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总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无知。”——“……在新奥尔良,只要妻子讨厌丈夫,她就有权离弃自己的丈夫。在这样的地方就没有不贞的妻子,因为妻子没有必要欺骗自己的丈夫……”

(2)霍尔巴赫。“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脱离自己,因为他不能不顾自己。”……但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要爱别人,因为别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道德向他证明,在一切存在物中,人最需要的是人”……“人若没有情欲或愿望就不成其为人……人若是完全撇开自己,那么依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消失了。人若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毫无情欲,自满自足,就不成其为社会的生物……”

(3)边沁。“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

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像其他一切人一样，构成了社会的一部分吗？你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如果承认为了增进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是一件好事，那么，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

与此相联系，马克思还明确地指出：“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从这里，他才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看法，而且懂得了马、恩所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才是最符合人性的。而李卓吾的那些观点其实是与爱尔维修等人的学说相通的，所以他确是晚明的进步思想家。

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使他在今后的较长时间内一直认真阅读马、恩原著，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读到《资本论》。

章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承担的关于金圣叹的一节却受到了刘先生的特别关心，因为刘先生觉得金圣叹的评价问题很复杂，难于把握；其时恰好学术界在展开对金圣叹的讨论，就想把这一节先作为单篇文章拿去发表，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他把章先生写的原稿看了以后很感满意，稍作改动后就作为刘先生与他合作的论文拿出去

发表了，题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刊载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1963年）。不料发表以后在国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却在海外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的王靖宇先生在1972年出版的《金圣叹》（*Chin Sheng-t'ai*,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72）一书中评价说：“这是中国大陆迄今所发表的重新评价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最佳和最客观的论文。”（“The best and most objective reevaluation of Chin's criticism that has come out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to date.”）

在关于金圣叹的论文发表的上一年，《洪昇年谱》也完稿了，并于次年交给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出版社经审读后决定出版，但鉴于政治形势日益严峻，就一直拖着，不敢出书，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先后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科优秀著作奖和教育部第一届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

总之，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〇年代的二十六七年间是章先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准备阶段。在这期间，通过夯实学术基础和漫长的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案研究，他已完全具备了对中国文学史从事总体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的学识和能力。

三、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思考

经过了上述的准备阶段，章先生不但掌握了大量的文学史资料，而且自从在《神圣家族》里获得了关于人性问题的启发后，通过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已初步认识到了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地说，每个时代的人性中都体现了“人的一般本性”，又都体现了在每

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就人的一般本性来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514页)因此,马克思把“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视为对人性的剥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35页)。这里的所谓“需要”,不仅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温饱,而且包括享乐和显露自己的生命(《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66-167页),后者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最终则是达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649页)。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需要——包括个人的权利、自由、尊严、快乐、幸福等等——将日渐提高其满足度,最终获得全面、充分的实现,人的个性也必然越来越丰富而强烈”(《中国文学史新著·导论》5页)。”而就“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来说,既由“人的一般本性”所决定,又由于受具体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每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都存在着至少看起来与“人的一般本性”相矛盾的成分,越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这种成分就越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就逐渐被克服。而文学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与人性的演进同步的。不过,由于文学是以感情来打动人的,文学中的人性的演进也就体现在其感情的变化方面。

在一九八〇年代初,他对自己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上述状况已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因而认为有条件对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联系进行探讨了。又考虑到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他决定分阶

段来进行,并先从明代文学入手。

章先生之所以选择明代,一面是基于他那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演进同步的观点,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早年学习现代文学时就已知道“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革命”所要求的是“人性的解放”,而且“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新潮存在相通之处,他由此认为在明代文学中可以较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前进的历程。也正因此,他在一九八〇年代前期先后给学生开设了“晚明文学研究”和“明代文学研究”两门课程。边研究,边教学。

研究的结果,他发现晚明文学新潮中确有可与“五四”新文学相通之处,而在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晚明文学新潮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相对立——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晚明文学新潮的旗手李卓吾就对前七子的最主要代表李梦阳评价很高,而且李梦阳的强调“真情”与李卓吾的提倡“童心”、袁宏道的标举“性灵”都有相通之处。所以,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实是晚明文学的先驱而非其对立面。为此,他撰写了《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发表(见《古田教授退官纪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日本东方书店1985年版和《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三期),成为这二十余年来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嚆矢。

在撰写该文的同时,他还发现李梦阳等人在明代中后期之所以受到许多人的崇高评价,是因为被认为开创了明代文学的新局面,而这不仅是与前七子以前的台阁体兴盛时期相对而言,更是与明初相对而言的。原来,明初是在朱元璋统治下的经济与文学都受到严重摧残的时期,文学由元末的繁荣一

变成极度的萧条，永乐帝又承其衣钵，文学遂处于长期的衰退之中；台阁体不过是文学处于高压下的必然产物。有些论著对明初文学给予肯定，乃是将元末文学的余响——朱元璋的打击对象——误认为明初的正声之故。对明代前期文学的这种描述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崭新的成果。而且，他还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在被朱元璋镇压下去的元末明初的文学中已经可以听到与晚明文学新潮相类似的声音，《明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卷首（见其《〈明代文学研究〉序》，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同时也是对于元代文学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高度积极作用的一种新的思考。

他对元、明文学的这种认识见诸文字虽然始于一九九〇年，但其实是在一九八五年就获得此一结论的。在这之后，本应推而上之研究宋代文学的历程，但在这方面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陈寅恪先生认为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时期，鲁迅先生却说：“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坟·看镜有感》）这两位都是他所十分尊敬的学者，因此他认为这问题比较复杂，就暂时先放一放，转而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总体评价。由于铃木虎雄、鲁迅等人早就把建安时期作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开始，受此启发，他很容易地发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意义——导致了中国的几乎是全面的发展（戏曲除外），并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深广的基础。他为此先后撰写了《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一期）和《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二期）。这不但是对国内各种文学史上对建安以后

（尤其是晋代和南北朝）文学的贬抑性评价的挑战，而且他也由此认识到了历史上对南朝文学的否定其实是一种与文学的前进背道而驰的意见。

在对魏晋至唐代的文学和元明的文学有了上述的估价以后，再来研究处于二者的中间的宋代文学就不致太困难了。他认为宋代诗文（不包含词）演变的总体趋势与魏晋至唐代文学的走向是相矛盾的，与元代、明代文学中的新的声音更是对立的。他为此写了《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宋诗简论》（《上海文论》1989年第三期），这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引起了不少非议，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就这样，章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年间，分阶段地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过程作了独立的思考，在吸取前人的建安为中国文学自觉阶段的开始和晚明文学中已存在与“五四”新文学相通的成分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阶段的性质、状态都提出了新的见解，纠正或补充了前人的认识，使魏晋至晚明文学发展的轮廓更为充实、确切和鲜明。值得注意的是：他从前辈学者中所吸取的养料，都来自“五四”新文学学者（铃木虎雄的关于中国文学自觉阶段的观点，他是通过鲁迅的文章才知道的）；所以，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实与“五四”精神息息相通。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章先生仍就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过程继续进行思考。但在最初的两三年，不知是由于过度疲劳还是由于研究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瓶颈的阶段，他的思路忽然很枯竭，只能对以前已获得成果稍作补苴（例如发表于1992年3月15日《文汇报》的《中国文化的历史转折点——明初》，虽对元代文学的繁荣和

明初文学的衰落作了较具体的比较,提供了若干新的材料,但不过是以以前发表过的《〈明代文学研究〉序》中的某些论述的补充),而不能进一步深入了。于是,他就索性乘此时机为自己“充电”。在这期间,他集中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二十世纪较新的美学论著。直至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间,他才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又取得了重大突破。

四、《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构思、

撰写及其增订本的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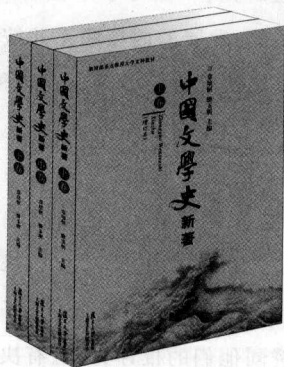
正在他思路枯竭之时,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与骆玉明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完稿了,并于一九九三年通过了专家审查。

此书本来是作为高等教学自学考试教材而编写的,参加编写的除章先生外,在当时都是青年学者,如葛兆光、钟元凯、李庆等先生,在学术上都有突出成就。章先生只为此书写了确定基调的《导论》和极少的章节,其他都出于编写者自己的发挥。这当然难免出现各说各的、甚至相互矛盾之处,则由骆玉明先生通过统稿来解决。

虽然事先缺乏统一的安排,但由于编写者自己的创新意识,书稿的绝大部分都打破了将文学史作为政治的附庸的旧模式而注重作品的感情本身,看起来与《导论》的强调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演变同步颇为一致。此书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钱谷融、钱伯城等先生誉为“石破天惊”之作,清华大学的孙明君教授也说它“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它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打破了旧的思维定势,完全走出了政治因素干扰的时代”(《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一期《追寻遥远的理想》),其故也就在此。

不过,就章先生自己来说,书稿虽已获得审查通过,他却同时清晰地看到了书中所存在的缺点:第一,《导论》本身具有明显的问题:只强调文学发展与人性演变的同步,却对文学的形式缺乏应有的重视(这是他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集中研读西方美学论著所获得的新的认识),全书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样的缺陷,尽管若干章节在这方面具有较好的成绩(例如葛兆光先生承担的部分);第二,全书的各部分虽大都各具新意,但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第三,采取王朝分期法,看不出各个时期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色和意义;第四,全书的部分章节之间在学术水平上不大平衡。但他认为编写者已为此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就书稿本身来看,较之以前的各种文学史已有了重大的突破,那就应该赶快公之于众,而不应辜负编写者的努力,一味拖延下去。

然而,在此书输入电脑和印刷的过程中,章先生却取得了在文学史研究中进一步突破的契机——上海辞书出版社请他为《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写一篇序,他想借此机会进一步阐明元明清诗相对于宋诗的重大进展,但如何着手呢?想了好久,忽然觉得不妨以“五四”新文学作为比较的基准。该《序》一开始写道:



在有些人看来,元明清诗歌在成就上不仅远逊于唐诗,而且也大大不如宋诗。但在实际上,元明清文学正是从宋代文学发展到“五四”新文学的必不可少的桥梁。自然,“五四”文学还吸取了异域的营养,但我国文学如不曾经历过元明清时期的虽则是缓慢的发展,而仍然停留在宋代文学的阶段,也就根本不存在吸取异域营养的前提。倘若有人认为“五四”文学只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怪胎,远没有宋代文学之纯正可爱,那自然无话可说,否则也就不能不承认元明清文学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元明清文学的上述桥梁作用不但体现在戏曲、小说方面,也体现在诗歌方面。(《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卷首)

按照这样的思路,果然较轻易地说明了元明清诗(明代前期诗除外)相对于宋诗的重大进展。由此章先生发现了文学史研究的一条新路:把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终点站(当然,它同时又是起点站),再回过头来观察其经过的各个站点,一切就很清楚了。

根据这一发现,他一面倡导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一面寻求中国古代文学(含前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并按照其各个阶段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期。在这种情况下,后一项工作就变得事半功倍了。所以,在复旦版的《中国文学史》于一九九六年出版后,在备受好评的同时,孙明君先生等人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不足之处(采用王朝分期法,有些章节的学术水平不很平衡),他不但完全赞同他们的批评,而且有决心和信心

在短时间内重写一部,那就是《中国文学史新著》。

可惜好事多磨。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于一九九八年出版了两册后,章先生因病而不得不停止了写作;直到二〇〇五年才重新动笔。在这期间,他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认识又有所深化,不但把近世文学由原来的萌生、受挫、复兴三期增改为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而且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看法,如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了《玉台新咏》为南朝陈代的一位妃子——很可能是张丽华——所编,那就对于研究女性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在二〇〇七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较之一九九八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上、下两卷又是一种新的境界了。而无论是原先所出的两卷还是二〇〇七年出版的增订本,都对文学的形式作了着重的探讨,如同《书城》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号的《〈书城〉荐书·〈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所说:“从来没有一部中国文学史能像本书这样跳出社会史、思想史的窠臼,从以往过多的外部研究回到对文学本体的考察,真正将美感特征作为求证问道的门径。书中据于文学形态学的梳理和辨析,显然具有特殊的史述意义。”不过,这种对于文学的形式特征的重点探讨,跟章先生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并不矛盾,而且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发展。李欧梵教授在为陈建华博士《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所作的《序》中说:“记得多年前我旁听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家演讲,他一再强调形式的重要——‘form, form, form!’他重复说了数次。这种形式上的演变、它的内容及作品背后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制作过程,